

改革以来周期性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张 锐

自改革至今,我国发生过4次中度通货膨胀,表现出了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第1次是1980年。随着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决策层和广大群众普遍存在着加速经济建设的内在冲动。因而制定了“详跃进”计划,大上基本工程,基本建设增长过快,在1978年增长50.2%的基础上,1979年又增长了13.8%,国防支出也大大增加,财政收入由于种种原因又有所下降,不包括国债在内的财政赤字高达170.6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的增长率为20.7%,1980年达到22.6%,导致零售物价在1980年上涨了6%。尽管按现在的标准看这一物价上涨幅度还不算高,但是由于在1979年前,我国物价水平始终十分稳定,按当时标准,6%的物价上涨幅度已经超出了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

第2次是1985年。1984年我国的经济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后,首先在价格上实施以调为主向以放为主的转变,从这一年开始,我国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已基本放开,生产资料的价格也开始逐步放开。价格的放开极大地刺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了供给的急剧增加,从而拉动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导致全国性物价总水平的上升,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上涨了11.9%。

第3次是1988年。1985年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促使中央采取紧缩货币的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了1986年经济的急剧下降。然而从经济运行的规律来看,1985年这一轮经济周期过程并没有结束,因此一旦中央货币政策有所松动,经济增长速度立刻反弹。由于1987年货币的过量发行,1988年出现了负利率现象。由于前两次通货膨胀的教训,大多数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加上这一年“闯物价关”的宣传误导,又在适当的时候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从而促成了居民通货膨胀预期的迅速提高,造成居民挤兑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这一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达27.8%,比1987年上升10个百分点;同年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上升了20.7%,并且这一增势一直持续到1989年。

第4次是1993年。随着1991年我国经济走出低谷,1992年经济增长加速,潜在通货膨胀开始得到释放。进入1993年,经济又重复出现了1985年那种超乎寻常的增长速度。1993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1.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50.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了26.1%,银行现金支出增长了68.3%。在这一前提下,通货膨胀的释放速度开始明显加快。

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比上年上涨了26.3%,零售物价上涨了13%,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涨了14.7%。此外,起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大量“准货币”的流动,这种“准货币”就是在1993年出现的各种欠款条子,它的流行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三角债”形式,这种形式从根本上破杯了政府的金融政策,因此尽管政府从1992年9月起采取传统的货币紧缩政策企图控制贷款规模,但却效果甚微,通货膨胀至今仍在持续。

以上4次通货膨胀给人以两点较为深刻的印象:一是物价上涨与我国的价格改革关系密切,每次重大的价格改革措施出台,都会引起物价不同程度的上涨;二是4次通货膨胀似乎都是经济的高速增长的伴生物,统计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呈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因此我国的通货膨胀也显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下表反映出了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此种关联。

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比较表

	周期峰顶 (1980)	周期谷底 (1981)	周期峰顶 (1985)	周期谷底 (1986)	周期峰顶 (1988)	周期谷底 (1990)	周期峰顶 (1993)
全国 GNP 增长率	7.2%	4.4%	12.8%	8.1%	11.3%	4.1%	13.4%
全国职工生活费用 价格总指数	7.5%	2.5%	11.9%	7.0%	20.7%	1.3%	14.7%

资料来源:《经济统计年鉴》(各年)

既然如此,我们寻找通货膨胀的成因就应该从我国价格改革的内在规律以及导致我国经济过热增长的体制因素入手。我国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是需求过热。而在最终产品的三大需求中,由于出口需求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因此需求过热集中表现在消费需求过热(由居民与企业推动)和投资需求过热(由政府与企业推动)。这样,我们分析通货膨胀的成因就应当将视点对准价格改革政策、消费需求规律和投资需求规律。

二

价格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价格体系的调整 and 价格管理体制的再造。价格体系的调整是指为理顺计划价格时期的比价关系而作的统一调价;价格管理体制再造是指订价权限的下放以及价格形成机制的转变。

我国价格改革在1984年以前是以调为主。1985年以后,价格改革的重点逐步从改变价格体系的不合理转向对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扩大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 and 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然而,我国的价格改革是在价格体系严重扭曲 and 抑制型通货膨胀双重背景下进行的。这一双重背景实际上暗示着不可能通过全面放开价格来理顺价格体系,因为这将导致物价的大幅度上涨,使人们难以承受。在价格改革过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就是工农业剪刀差 and 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的剪刀差问题。我国粮食价格偏低一方面产生农民“扔”土地现象,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学生扔馒头现象,价格问题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外,我国运价偏低、电价偏低、煤价偏低等都形成了对这些瓶颈产业扩大供给的制约。当然国家可以采取大幅度提

高农产品和基础产品价格的办法来发展农业和基础产业,增加有效供给,但这会导致加工工业在无法承受原材料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提高加工业产品的价格,进而导致对居民物价补贴的进一步增加。这是一种典型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单纯从理论上的分析,提高农产品和基础产品价格可以刺激农业生产和基础产业生产达到供需均衡状态。然而从实际来看,由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和资源的有限性,价格对于农业生产率和基础产业的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十分有限。在农业和基础产业的生产率还未能通过技术进步产生质的飞跃,或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所形成的供给还跟不上人口增长和工业增长所形成的需求时,农产品和基础产品价格的提高必然会逐步推动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的提高,并且反过来加大农业和基础产业的生产成本,造成一种连环式的价格爬行。

当然,尽管价格改革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但也并不能得出通货膨胀就是价格改革带来的结论,而只能是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之一。因为影响物价上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价格改革引起的物价上涨,一种是由于社会总需求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价格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理顺价格,使过低的农产品和基础产品的价格恢复到正常状态。为此要求有比较宽松的宏观环境,并且采取适当的改革步伐。因为在比较紧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出台较多的价格改革项目,容易造成物价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加剧通货膨胀。但是,即使宏观环境较差,价格改革也不能停滞,否则矛盾会越积越大,对今后的改革不利。此外,价格改革对象以及出台时机的选择,都将对市场物价和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据统计,1988—1993年,由于价格改革而造成的物价上涨因素分别为7.7%、3.5%、2.0%、2.5%、3.3%和5.3%。这种价格改革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我们在制定反通货膨胀策略时不可忽视的。

三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除了上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外,更为普遍的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尽管发达国家也会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但其运行轨迹具有振幅小、增速慢等特征,一般不会出现发展中国家那种大起大落的局面。产生这种通货膨胀表现形式上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机制不健全。就市场机制来说,就业结构富有弹性,企业预算硬约束,配置资源的灵活性是缓解通货膨胀的主要力量。

我国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中,80年代中、后期的两次中度通货膨胀主要是由消费需求拉动的。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首先,我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是让人民受益,因此伴随着70年代末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就成为80年代的一个显著标志。然而由于在居民收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同时拓宽居民的支出空间,因此,从80年代初期开始,就形成了城镇居民对于耐用消费品较高的购买预期,这种趋势至80年代中期形成了排浪式的购买高潮。由于耐用消费品具有投资品的一般特征,因此出现了居民消费需求对当时尚处在短缺状态的耐用消费品工业的集中压力,从而形成了以消费品价格上涨为主要特征的通货膨胀。至80年代末,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已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其标志是以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为代表的第一代家用电器在城镇居民家庭中基本普及。1989—1991年我国家庭耐用消费品第一次发生滞销就很能说明问题。

进入90年代,尽管我国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已从1989年的4400多亿元猛增到1993年的13000亿元,但是类似80年代那种排浪式消费膨胀模式出现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这是因

为：近几年的改革大大拓宽了居民收入支出的空间，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是居民投资渠道的拓宽，证券市场的开拓对于吸纳消费基金起到极大的作用；二是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的出台使很大一部分居民收入从流动状态转向凝固状态，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消费基金对价格上涨的压力。

值得警醒的是，尽管90年代消费需求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减弱，但并非居民通货膨胀的预期也不存在，相反，在经历了80年代中度通货膨胀冲击后，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不断不会减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1992—1993年社会集资之所以热得烫手，与通货膨胀率超过银行利率以及居民由此而形成的通货膨胀预期不无关系。1993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19.6%，黄金因居民抢购而销量倍增^①，应该是这一预期结果的现态表现。

四

进入90年代以来，由投资需求膨胀对物价的拉动已引起了经济工作者的密切关注。自1949年至今，我国曾发生过5次年增长率在30%以上的投资膨胀。第1次是1958—1959年，这两年投资总额的平均增长率为56%，其中1958年的投资增长率达84.5%；第2次是1970年，这一年的投资增长率为49.1%，当然这一增长率是在1967年和1968年投资总额连续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的，具有恢复投资的性质，因此并没有对经济带来明显的影响；第3次是1978—1979年，这两年投资总额的平均增长率为32%，其中1978年的投资增长率达50.2%；第4次是1985年，投资增长38.8%，进而带动了经济过热；第5次是1992—1993年，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为37.6%，1993年增长至50.6%。从投资膨胀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看，除了1970年那次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外，其余四次投资膨胀都导致了物价指数的上扬。

作为我国经济体改革重要内容的投资体制改革目前已提到了前台，这一改革牵涉到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许多问题：

1. 企业自我清算机制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其自我清算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以资抵债。而这一点又恰恰是改革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企业没有破产机制，在企业亏损时，只能由财政对企业的亏损进行补贴，这种企业迫使财政进行补贴的倒逼机制是造成财政连年赤字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时，有一种现象发人深思，这就是利率调高只对存款产生刺激作用，而对贷款产生不了压力。这种宏观调控事倍功半的原因是企业“不怕亏”，更不怕投资贷款的高利率。企业缺乏自我清算机制的第二个特征是资产存量不能通过清算机制进行流动，因此在企业无力归还所欠款项时，所导致的后果只能是三角债，三角债的形成是企业对银行形成的倒逼机制，这一机制增加了银行增发货币的压力，从而进一步对已形成的通货膨胀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不彻底已形成了对财政和银行的双重倒逼机制，这一双重倒逼机制是企业投资膨胀的根由，也是拉动投资需求型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

2. 政府投资行为的约束机制问题。随着企业自主权的逐步扩大，政企行为的逐步割开，改革以来的政府的投资方向有了很大改变，由过去直接投资企业转向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政府这一投资方向的改变对于改善我国的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政府对投资仍然存在着冲动的基础，因此与这种冲动相对应的投资资金来源便成为调节政府投资冲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目前情况看，政府的投资资金主要有以

下几个来源：一是财政拨款。1992年，国家财政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7.3%，尽管保持了1991年的水平，但是，财政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额却上升了；二是直接融资。1992年以来，地方政府如同企业一样得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自主权——直接融资权。他们可以大大高于银行的利率从社会各方面直接融资。1993年，在企业和地方的直接融资金额中，地方政府占了30.6%，在地方利益的刺激下，这部分资金必然绝大部分表现为投资行为的冲动；三是利用外资，主要是利用国际组织的赠款及无息、低息贷款。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在逐年增长，但其规模毕竟太小，到1993年利用外资仅占我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8.9%。由此可见，当前我国投资额中的80%的投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和社会集资。政府大量向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的后果是埋下了银行货币财政性发行的隐患。这一隐患是否变成现实，主要取决于金融系统的独立程度，而我国的金融系统恰恰在这方面暴露出了致命的弱点。

3. 金融改革滞后问题。由于受到多重制约，我国金融改革时至今日仍然步履艰难。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银行(尤其是中央银行)的非独立性，其货币的政策主要受制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旦政府的宏观政策产生失误，其货币政策也随之失误，从而不能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起制衡作用；(2)在地方和部门的攀比机制下，地方政府与各个部门在投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数量型扩张冲动。这种数量型扩张冲动与银行的非独立性一结合，就必然会产生地方政府“逼迫”银行贷款的行为。加上企业无破产危机和财务硬约束顾忌，在经济增长的高潮时不怕投入品价格迅猛上升所造成的高成本，也不怕筹资的高利率，对投资总是持“多多益善”的态度，进而在经济景气时形成一股投资需求拉动的合力，使银行的贷款失控；(3)随着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的储蓄已成为银行贷款资金的主要来源。由于社会各界金融意识的增强，厂商及各类投资者都会对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之间的成本效益进行计算，进而形成了投资者与银行争抢居民储蓄和社会游资的局面，从而进一步推动投资的膨胀；(4)银行职能混乱。银行在改革初期强调的是银行从事业性质走向企业性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营政策。事实证明，由于没有把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加以区分，这种一味强调自负盈亏的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银行是财政的“钱袋”的弊病，反而使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偏离银行本身的职能，形成了银行利用融资中心的便利，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进行投资。这一方面表成了新的资金垄断现象，大大削弱了银行作为宏观经济调节中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投资需求的进一步膨胀。

五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对改革以来周期性通货膨胀的原因形成了以下几点认识：(1)周期性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体制造成的，这些因素主要是价格改革过程中结构磨擦所造成的成本推动，以及消费和投资膨胀所造成的需求拉动；(2)80年代中、后期的两次中度通货膨胀主要是由消费需求膨胀拉动的。由于我国已在80年代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耐用消费品购买周期，而90年代的这一成因由于居民收入支出空间的拓宽而减弱，因此90年代出现消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已经很小；(3)1993年以及整个90年代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是投资需求拉动型。形成这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一企业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二政府缺乏投资约束机制，三金融缺乏制衡机制。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由于约束机制的软化，因而必然存在着无止境的“扩张冲动”，这种扩张行为是以改革时期的过渡体制为存在基础的，它时时潜伏在过渡时期

的体制中,一有机会,就可能发作。作为调节货币流通量的两大“水龙头”财政和金融体系必须随着企业和市场的改革步伐相机而动,一旦宏观调控政策与市场、企业改革脱节,就有可能失效,从而造成投资膨胀。(4)在以上3方面导因中,价格改革尽管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它却是促进市场经济建立和经济正常增长的合理因素。因为市场经济建立和经济正常增长都需要有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价格改革正是为了扭转计划经济条件下价格体系的畸型。因此,尽管在价格改革中引起了价格的成本推动或价格连环爬行并形成通货膨胀,但这却是加快市场经济,建立和推动经济正常增长必需付出的代价。

面临明显的通货膨胀,价格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增加了价格改革的难度,限制了价格改革的活动空间。因为,在目前物价总水平已经处于较高台阶、消费者承受力有限的情况下,价格改革步伐不能迈得过大;同时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进行价格改革,必然会造成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为尽量减轻这种影响,就必须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逐步消除通货膨胀;为避免加剧通货膨胀,保持价格总水平的相对稳定,必须控制总需求的过快增长。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我们只能进行有限的、不致于加剧通货膨胀的价格改革。为此价格改革政策应体现出以下几方面基本要求:(1)通货膨胀条件下既不能出台过多的价格改革项目,也不能采取冻结物价的政策;(2)坚持控制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价格结构的调整上;(3)尽量减少和慎用价格补贴政策;(4)价格改革要与工资、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改革密切配合,不可孤军突进;(5)价格改革要与企业改革和市场发育程度紧密契合。

一般说来,治理由投资膨胀所拉动的通货膨胀的难度较大。这是因为在投资膨胀时期所形成的在建项目一般具有专用性和不可流动性,造成已投放的资金不可能收回,而且必须追加资金才不至于造成已投资金的浪费。因此目前政府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尽管阻止了过度通货膨胀的势头,但由于这一轮经济增长的周期并没有结束,经济过热的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加上已形成的投资规模还会起作用,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危险依然存在。为此政府应当在以下几方面继续作出努力:(1)严格按照《90年代产业政策纲要》中所规定的固定资产项目规模的标准,对现有的工程项目进行清理整顿,坚决砍掉“超编”工程;(2)综合运用计划、信贷、利率、税收、财政及必要的行政手段,适当控制全社会固定资产规模和消费基金的高速增长,以减轻对货币、信贷的压力,减轻社会总需求的压力,从而缓释通货膨胀的压力;(3)综合运用计划、法律和经济手段,适当控制社会集资的规模,搞好全社会资金的综合平衡,同时注意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4)继续严格控制全国的信贷总规模,防止金融机构通过其他途径搞资金超规模“体外循环”。(5)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在适时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同时,注意加强对社会集资利率和其他融资利率的管理。

注释:

①刘秋生:《对我国消费市场行为的分析与思考》,《管理世界》1994年第3期。

(责任编辑 徐云鹏)